学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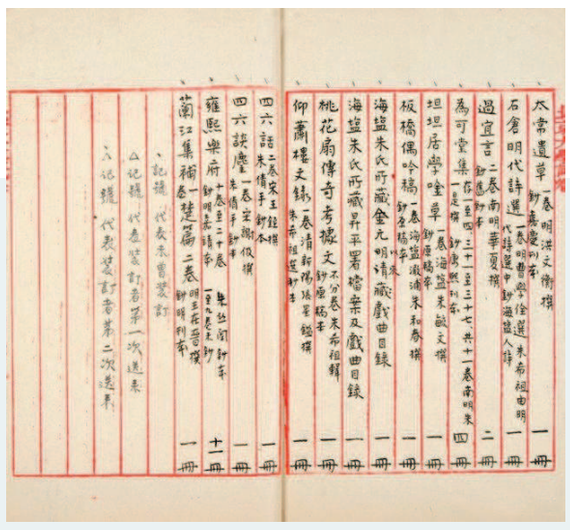
罗家伦的不可信回忆

王蔚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北平教育机关后，将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1956年，罗家伦在台北口述回忆了任职清华的经历，其中谈到他注意培养人才，坚持聘请学有专长的年轻教授，提供优越的研究环境，卓有成效。最典型的是为请蒋廷黻到清华做历史系主任，得罪了自己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朱希祖：

我不愿意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好恶来定去取……我决不请有虚名，而停止了上进的时下所称的名教授；我所着眼的，是比较年轻的一辈学者，在学术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础，有真正从事学术的兴趣，而愿意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出的人才最多，如萨本栋、萨本铁、周培源、杨武之、李继侗等，都是很有贡献的人。在中国文学方面，我很注意培养新文学建设的人才，而扬弃腐朽的传统，如杨树达、朱自清、俞平伯等诸位，都是我那时候请进去的。

朱希祖（1879—1944）



“读书藏书家”朱希祖的“郘亭藏书”后经长子朱偰整理，分批捐与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图为朱偰所编《郘亭藏书目录》。

均资料图片

在社会科学方面，如蒋廷黻、叶公超、浦薛凤、陈之迈诸位，都是特出的人才。并且我为了请蒋廷黻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得罪了我的老师朱希祖先生。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历史学系朱先生资格最老，若是要请系里原有教授担任系主任，这不但朱先生感觉不安，而且其他的教授也不肯；若是我让朱先生担任系主任的话，那朱先生因为是中国史学的专家，对于世界史学的潮流没有接触，自然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的路上，这是我要请蒋廷黻的理由。不巧那时延黻在南开大学任教，要歇一年才来，所以这一年之内，我只有以校长的地位来兼史学系的主任，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学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清华1925年成立大学部，招收首届本科生。朱自清、杨树达分别于1925年和1926年到清华教国文，与罗家伦无关（按：杨树达非新文学人才，或为杨振声之误，后者系罗家伦所聘）。浦薛凤和陈之迈均出身清华高等科，留美学政治学。浦薛凤的回忆录《万里家山一梦中》记叙了他回母校教书的过程：“予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即蒙业师余日宣先生函邀返校执教，旋即收到温应星校长所发聘书。其后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中央发表罗志希先生为清华校长。当时略有谣传，谓温任一切聘书是否有效。……九月中旬罗校长就职，当日即普遍加发聘书，并一律约略提高薪金。”可见罗家伦称不上浦薛凤的伯乐，只是顺势认可了聘书。罗家伦掌校后因强硬推行军训、言行浮夸等原因招致清华学生反感，1930年5月，在学生驱逐下辞职，再未返校。而陈之迈是1928年从清华毕业，1934年回校任教，功劳更不能算在罗家伦头上。如此信口开河，使得“为请蒋廷黻得罪朱希祖”这桩与其他人的记载相悖的轶事显得更加可疑。

罗家伦1928年9月18日就任清华校长，随即整顿校务，准备10月中旬开学。9月28日，朱希祖次女朱倓的日记记录了朱希祖到清华拜访罗家伦的情形：“父与其谈论，知国文系方面辞退三人，朱二阿哥（按：朱希祖嫉甥朱洪）亦在被裁之列。另聘请钱玄同、刘叔雅、单不厂、俞平伯诸先生。盖此数人者，皆稍有名望也。父被任为历史系主任，后经父推辞请其自担任之，罗已首允。历史系方面辞退陆懋德一人。”

女儿的日记应是忠实转述朱希祖的说法，较之多年后的回忆更接近当日情形。而在朱倓笔下，罗家伦聘人看重名气，国文系想请的钱玄同、刘文典和单不厂均非年轻学者，教的也不是新文学课。陆懋德是1926年清华历史系首任系主任，建系规划中，他提出中西并重，以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广为搜集东西方史料，吸收外国学者新近研究成果，添设考古学室等主张。除考古一项，其余思路与罗家伦没有分歧，但他个人的种种立场，都恰是罗家伦的对立面。罗家伦支持新文化运动，陆懋德则时任教育部视学，受命劝导学生。1922年，陆懋德到清华讲授中国史，次年将讲稿整理为《周秦哲学史》出版，书中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当作主要批评对象。1926年，他还与清华同事吴宓和梁家义、王文豹等政府官员组织读经团，轮流主讲。罗家伦将陆懋德辞退，更像是出于门户之见，并不如标榜的那样公允。

朱希祖的辞让或有客套意味，但身为北大元老，他在清华只是客卿，无意染指系务在情理之中。他1913年到北大任教，1919年史学系建系不久即任系主任，长期当选评议会成员，对校务决策颇有话语权。1927年，奉系军阀入主北京，北大被改组为京师大学，原有教师纷纷出走，朱希祖也转往清华。虽已离校，他仍密切关注校中动向，以北大人自居。1928年6月奉系败退，京师大学随之倒台，北大学生发起复校运动，朱希祖也有参与。国民政府最初推行大学区制，将北平九所国立高校合并为中华大学，后又改名北平大学，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各校师生纷纷抵制。朱希祖支持北大复校，甚至冒充学生口吻撰文发表对北大办学的意见，呼吁坚持教授治校，专心治学（《我也来谈谈北京大学》，载1928年7月27日、29日、30日《世界日报》，署名一鸣）。1929年1月，北大得以在北平大学内保留北大学院的完整建制，陈大齐任院长，2月下旬到校，受到欢迎。2月26日，陈大齐约朱希祖回校重建史学系，他立即答应，开始为聘请教授积极奔走。对他而言，回大本营当系主任，显然比在清华更适宜。3月1日，他便去向罗家伦请辞清华教授，改为兼任讲师。半月后，北大选出七人组成的评议会，朱希祖又在其中。

朱希祖一直主张以西方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也花了很大力气聘请西洋史教授和外国专家。他最推崇德国史学家兰普雷希特借助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文化史，认为史学应是科学的史学，为北大史学系设计的课程特别注重补充社科知识，这也符合现代史学的趋向。他在1924年为何炳松译《新史学》所作序言，1929年撰《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等文中，均阐述过治史和治系理念。罗家伦称其“对于世界史学的潮流没有接触”“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的路上”绝非事实。1928年底，朱希祖联合北平高校师生成立中国史学会，罗家伦也列名发起人，高票当选委员。回到北大后，朱希祖仍在清华历史系兼课，并将包括罗家伦和蒋廷黻在内的清华教授都请到北大兼课，转投师大的陆懋德也在聘请之列，可见他与这几人都保持良好关系。现存1929年1至3月的朱希祖日记载有多处与罗家伦的交往，二人曾一起摘录史料、赴宴、购书，朱希祖也不止一次去过罗家。

而另一当事人蒋廷黻在回忆录里说，“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也与罗家伦口中的虚席以待一年相去甚远。民国学校的聘书按例一年一发，在学期结束前商定。9月开学后，蒋廷黻即到清华历史系任教，和他一起从南开转往清华的还有生物系的李继侗和经济系的萧蘧。他们从南开出走，除了清华的邀请，实则还有南开方面的因素。

萧蘧（叔玉）的堂弟萧公权也在南开执教，他在回忆录写道：“叔玉脱离南开，可以说是不欢而散。……五月中学校发出下年度的聘书。除叔玉外，所有我们相熟的人都加薪十元廿元不等。叔玉来对我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回仍没加薪。我想这是他们对我示意。我不能赖在这里了’。廷黻接到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邀请，来商谈去就问题，听见叔玉被学校冷落，大为不平。他对叔玉说：‘我们同去清华好了’。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系来信敦请叔玉。”1928年底，南开校长张伯苓出国考察，次年9月方回校。时任南开大学部主任的黄钰生晚年回忆：“张伯苓校长出国，我在无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的情形之下，轻听了一二有偏见者的怂恿，不经评议会的审议，擅自处理了一位成绩斐然的教授的调薪问题，因而引起了公愤，五位名教授拂袖而去，致使大学部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另一篇回忆里，黄钰生指明，反对给萧蘧加薪的是张伯苓的秘书伉乃如。

1929年5月时，清华也正经历动荡，罗家伦本人并不在校。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开办的清华原由外交部管辖，改为国立后归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管理，董事会成员由两部任命。清华董事会1929年4月初在南京开会，罗家伦也赴京出席。董事会否决了他提交的校舍建筑计划，核减校内下年预算，反而增加留美专科名额和经费，罗家伦愤而辞职。随后，清华学生发起“改隶教育部，取消董事会”运动，派代表向国府请愿，教授会和评议会也集体反对董事会的决议。罗家伦离校后，校长由教务长吴之椿代理。校聘任委员会4月26日议决，除特殊情况外，在下年预算未确定前不添聘教授。5月10日，国务会议决定清华改由教育部专辖，“改隶废董”取得胜利。5月24日的清华校刊报道了萧蘧将来校任教的消息，在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引荐下，代校长吴之椿用通信表决方式征得聘任委员会同意。罗家伦于6月12日回清华复职，返校后透露，历史、政治、化学等系将增聘教授，在京期间已大致接洽妥当。8月7日，聘任委员会开会，正式通过包括蒋廷黻在内的一批新聘教授和讲师。

罗家伦在清华时的秘书郭廷以1969年的口述史曾谈及，聘请蒋廷黻最初是出自他的慧眼，并非罗家伦自发：“我到清华后，发现一份《近代外交史辑要》，油印本两百多页，没有印作者姓名但觉得有头绪、有体系，我问刘崇鋐，他说：‘可能是蒋廷黻的’，打听果然是他的，我拿去对罗先生说：‘这个很值得请’。罗先生立即写信请他，蒋大为高兴，初来月薪三百八十元，第二年升四百元，而且立即给他当历史系主任。”此外，罗家伦的北大同学毛子水1977年在纪念罗家伦的座谈会上说，他1930年回母校任教后，从北大教务长何基鸿处听说过罗家伦亲自从北平到南开强聘蒋廷黻的事。“蒋先生本不愿离南开的，但蒋先生若不答应去清华，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结合二人的回忆，罗家伦在1929年3月赴京前应已邀请蒋廷黻。

既然聘蒋廷黻与朱希祖并无冲突，罗家伦为何要说得罪了朱希祖呢？重新审视当时人事，便会发现，让蒋廷黻当系主任，的确可能得罪人。

罗家伦到清华后，历史系解聘了陆懋德，留下三位专任教授朱希祖、刘崇鋐、孔繁霱。孔繁霱从南开中学毕业后相继留学美、德等国，与朱希祖同在1927年被清华聘为教授。刘崇鋐是清华留美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已与罗家伦和蒋廷黻相识，在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曾一起组织留美学生后援会，编辑刊物。刘崇鋐1923年归国，和蒋廷黻同到南开任教授，1925年回母校任教。作为罗家伦旧交，且是清华自家人，在历史系时间最长，于情于理，他都是系主任第一人选。1929年1月，罗家伦任命了新一届清华招考委员会，开会商讨本年招生计划。委员会成员除了教务长、秘书长和各系主任，只有刘崇鋐是以普通教授身份代表历史系参与招生。但罗家伦并未顺理成章委以主任，而是自己继续兼任，直到聘来另一位旧交蒋廷黻，这不啻是对刘崇鋐的轻视。

蒋廷黻弃学从政后，刘崇鋐才成为系主任。他一直没有著作，且不擅长讲课。曾在清华就读的赵俪生晚年回忆，刘崇鋐的课“纯乎是一大堆bibliography，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罗家伦不让他主持历史系，或许真是基于学术考虑。

罗家伦口述回忆时，刘崇鋐正担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已于1944年病逝，后人未去台湾，大约这也是敢于将他当作反面典型的原因。不过，罗家伦这篇口述《我和清华大学》当时没有发表，身后方收入文集。1965年蒋廷黻去世，罗家伦在悼文中也忆及清华聘任系主任一节，只称“尤其是院长和系主任的职位，决不能为私人的交情而稍误青年的学业，因此而不能见谅于人者颇多。历史学系的人事，尤其使我遇到这种痛苦，我决定只能自己担当起这份担子来，以等待廷黻在南开最后一年聘约期满后，前来接替”，未点名朱希祖。

朱希祖重返北大史学系不到两年，便因学生抵制而辞职。1932年秋，他南下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同一时间，罗家伦在南京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34年初请朱希祖到校担任史学系主任。这也表明，他不是当真认定让朱希祖掌系没有发展前途。朱希祖在中大任教六年，从日记来看，他起初与罗家伦相安无事，开始心生嫌隙，是在1936年。当年7月，他等候许久方得以与罗家伦会面，结果话不投机。罗家伦指责他对教员待遇不公，而朱希祖认为对方听信谗言，且傲慢无礼，“骄矜而有德色”。1939年8月，朱希祖写给女婿的信中谈及罗家伦，已是大为不满，直指其“好植党而排异己，多疑忌而鲜诚意，权则集中于己，责则全归于人”。若说罗家伦得罪了朱希祖，应是在中大而非清华时期。

文匯学人 第539期

阿玛蒂亚·森的『四海为家』

严奕飞

刚听说阿玛蒂亚·森教授的回忆录即将出版时，*Home in the World*这个英文书名便在我脑海中自动化作了“四海为家”这几个字。无论作为书名翻译是否准确，在通读全书的过程中确实能强烈地感受到，用这个词来概括森的人生旅程简直太过贴切：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旅居缅甸、求学之路从孟加拉湾绕过印度洋延伸至英伦，日后的教学研究更是以德里、加尔各答、伦敦、牛津和两个剑桥为大本营而辐射向五湖四海……

这本回忆录聚焦的是这段遍及全球的旅程的前三十年。这意味着书中少了许多对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学术思想的系统性介绍，却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领略森恰同学少年的风华正茂鲜活地跃然纸上。

在书最开始的致谢部分，森担心沉溺于自身回忆，会让他人完全提不起兴趣。他说自己花了一番努力才保证了叙述的清晰和连贯性。现在看来，这份努力无疑是成功的，甚至会让人在阅读过程中连连感叹，这完全是多虑了。

森在书中大致依年代回顾了自己的童年与少年、在此期间的家国动荡、加尔各答与剑桥两地的求学时光，并用在德里经济学院的执教经历及思考为全书画上句号。如果说这番整齐的谋篇布局增加了阅读的流畅感，那么受益于森在主攻领域经济学与哲学之外的广泛涉猎，阅读过程中亦会伴随一种不断被随机掉落的“知识福袋”砸中的惊喜感。“福袋”的大小和内容自然因人而异，我的那份即包括但不限于：义净与法显西游取经的具体路线和收获、糅合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智慧的独特的“孟加拉历”San、达卡和勒克瑙这历史上的两大穆斯林重镇间的差异、以及身为舞剧作家和导演的泰戈尔不输其文学造诣的编舞才能。

其次，在内容方面，读者也很难不对森的传奇经历叹为观止。这种传奇不仅包括他那书香四溢的家世、由泰戈尔所起的不走寻常路的名字（本书书名的灵感亦是来自泰戈尔的著作《家园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或是他的哪位剑桥同学或前后辈日后成了哪国的总理或部长——即便跳出这些由人际关系而界定出的身份，阿玛蒂亚·森这位人物本身也远比世人所熟知的“诺奖得主”的标签更为生动和丰富。

森很早就展现了跨越时空的庞大而旺盛的求知欲；在入读管区学院（Presidency College，成立于1817年，为印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2010年改制为大学）的第一年即被诊断出患有二级口腔鳞状细胞癌，他更是凭着非凡的沉着冷静及时诊断，勇敢挺过了放射治疗；此后在申请负笈英伦的过程中，早早被剑桥大学发出拒信的他竟能在几个月后因他人退出而意外获得录取；因与一辆自行车相伴长达半个世纪而被诺贝尔博物馆要求将之收作藏品的获奖者，放眼全球大概也只此一位……

如果说这些惊人事例反映的是森异于常人的一面，那么趁着暑假靠搭车、买学生车票、住青旅而“把欧洲塞进背包”，在此过程中一次次地感受陌生人的善意，甚至还萌生过万一学无所成就去开旅游公司的念头，大概会让无数有过类似经历的留学生们会心一笑。而其就读的达卡圣格列高里小学的时任校长在获悉他得了诺奖后不久，本着激励在校学生的美好愿望翻出了森当年的试卷，却对他在全班37名同学中排名倒数第五而大跌眼镜，可能也会是广大“虎爸虎妈”们的同款反应了。

尽管系统阐述森的学术成就并非本书重点，但这些早年经历仍不失为更深入理解其学术追求的宝贵窗口。比如，正是亲历了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才会促使他在日后展开了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以期阻止类似灾难再次重演。而他在和平乡（Santiniketan，位于加尔各答北郊，泰戈尔1901年在此创建印度国际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在此期间跟随身为知名梵语学者的外祖父而管窥到的次大陆历史上的宗教宽容，也可看作是他日后渊博学识与深邃思考得以结出硕果的最原初的沃土。

也正因此，四海为家不仅可以理解成地理意义上的，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森虽未在书中引用《论语》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他在序言中所提出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这个词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对于这精神上的“四海为家”，他也早已是耳闻目染、身体力行：得益于泰戈尔的远见卓识及其召集至和平乡的“多国部队”（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并对印度的中国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谭云山教授），森在和平乡的课堂讨论可以从传统印度文学过渡到传统及当代西方思潮，尔后再前去探索中国、日本、非洲或拉美；从和平乡走出的毕业生所掌握的“十八般武艺”跨度之广，也时常令人啧啧称奇，不知可否看作“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延续与缩影。他的同学里有既是优秀工程师又是出色歌手的；比他早一年入学的萨特亚吉特·雷在无比耀眼的电影导演生涯之外，亦是一名驾驭了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家，甚至还设计过不少英文和孟加拉文字体。雷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是和平乡把我变成了东西合璧的产物”。

然而，正如《论语》中的另一句“学而不思则罔”所揭示的，如果说最大限度的求知自由凸显的是“四海为家”的浪漫气质，要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财富，则离不开理性思考的自觉。这意味着从嘈杂或空白中厘清真相，并运用不同视角去全面探析背后的“为什么”或“怎么样”。森在书中坦言，“自由”与“理性”的结合统一，或者说从多元化的汪洋中经由思辨而提炼出真知的能力，是和平乡的求学岁月带给他的相伴一生的精神资源。他对这两相结合的重要性的更一般化的阐述，早先已见诸其学术专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由此番回忆而引申出的对近期缅甸、印度乃至全球趋势的批判和反思，亦因这两个独到的落脚点而为本书平添了更多的现实意义。但出于研究社会与教育政策的敏感，书中最令我感动的故事是和平乡在体罚学生仍大行其道的年代里早早禁止了这种做法。外祖父在向他揭示禁止背后的深意时说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动作本身的野蛮，更是希望让学生了解到，做出正确举动必须建立在对何以为正确有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而非仅仅为了躲避疼痛或屈辱感。这本身也是在运用并享受理性思考的自由。

这本回忆录的写作历经近十载。差不多也是在十多年前，一名彼时刚结束首次印度之行的本科生在复旦文图的书架上邂逅了森和他的学生让·德雷兹合著的《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受书中第四章《印度与中国》的启蒙而开启了一段延续至今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与印度公共政策的学术生涯。同样四海为家了十多年后读到此书，也实为疫情期间莫大的安慰、指引和鼓舞。

（作者为南安普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讲师）

资讯

如何利用数据了解世界

编译/黎文

即便拥有越来越多的数据，许多人对世界的看法也相当偏离现实。总部位于牛津的研究机构“我们的数据世界”数据主管爱德华·马蒂厄（Edouard Mathieu）近日接受fivebooks.com网站的采访，介绍要利用数据了解世界，有哪些可靠的指南。他推荐的五本书里，有两位作者是扑克牌手，还有三位分别是医生、政治学家和数学家。

马蒂厄首推《事实》，由已故的瑞典医生、学者汉斯·罗斯林与子媳合著。这本书胜在简单直观，“无关那些花哨的机器学习技术。它是关于现有的数据——我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数据——能告诉我们的世界状况”。罗斯林曾调查瑞典的学生、政治家和记者，发现许多人对世界的看法要么偏颇要么扭曲，对已取得的进步没有准确认识，无论是儿童死亡率，还是当前世界的女童入学率。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处于一种可怕的状态。但实际上，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里，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类不应如此悲观。马蒂厄建议大家都登陆Gapminder网站做个测试，通过可视化数据，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掌握世界现状。

在更好地了解世界之外，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好的决定。马蒂厄说，其实他选的每本书都在描述贝叶斯定理。托马斯·贝叶斯是18世纪的统计学家和哲学家。他提出了关于如何理解世界的重要理论——根据一段时间内可获得的证据进行反复推论，不断微调。这个定理的方程式不重要，人们一旦掌握了其中蕴含的方法，就可运用到几乎每件事情上。

以我们想知道自己感染一种传染病的几率为例。很多人都会在两极之间摇摆：开始总是认为不可能得（近乎0%的几率），某天突然有了症状，就立马会想，哎呀，我中招了（100%）。

根据贝叶斯定理，正确做法是从一个基线概率开始。这可以是对本城目前感染人数的估计，如官方数据给出的3%。然后，当你获得一个新信息——例如，有了症状，就应该根据这个新信息去调整染病概率（或调至20%）。然而症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所致，因此不要直接作出最坏的判定。在贝叶斯定理下，凡事都不是直接进入最坏的状况。随着每个新信息的出现，你不断调整，直到得到对事件概率的最新最准确估计。不要见风就是雨。

马蒂厄说，在利用数据这方面，纳特·西尔弗的《信号与噪声》虽是十年前的旧作，但可能至今仍是数据科学、概率思维、机器学习及所有这些方面读物的集大成者。西尔弗做过扑克牌手、棒球分析师，还成功预测了两次美国大选。他认为区分海量数据中何为噪音、何为信号，至关重要。在贝叶斯定理之外，西尔弗强调在统计中要正确表达不确定性，还应考虑一系列可能的结果。

《对赌》的作者安妮·杜克也是一名扑克牌手。她对认知行为决策科学非常感兴趣。在书中，她比较了扑克和国际象棋。以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国际象棋是一种“完全信息”博弈。棋盘在前，两个玩家掌握所有的信息，他们知道眼前这个世界的全貌。在扑克中，情况恰恰相反，大部分信息是隐藏的。你只知道自己手中的牌，不知道牌桌上其他玩家手里有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揭开的是什么牌。

杜克认为，生活更像扑克，而不是国际象棋。在生活中，并没有一幅完整画面展现你希望拥有的所有信息。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猜测——猜测人们的意图，猜测事情如何发展。那么，既然生活更像扑克，你就得像一个扑克玩家那样去生活。你要“赢”，就须凡事都从概率角度思考，用扑克牌手的技巧做出更好的决定。

她还提醒人们千万要避免“结果”导向的思维，即以最后的结果来判断考虑过程的质量。举例来说，在任何一场足球比赛后，你都会听到专家们花几个小时分析场上发生的一切，并从中得出惊人的结论。他们激动地宣称教练应该被解雇，某球员不值得挖，某球员在什么时刻应该被换下。但他们忘记了，足球是一项随机性相当大的运动；也许教练做出了所有正确的决定，可即便如此，结果也未必更好。

马蒂厄推荐的第四本书是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与记者丹·加德纳合著的《超级预测》。泰特洛克依附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ARPA）进行的“良好判断计划”就发现，一些“超级预测者”远胜某特定领域的专家，例如他未必懂球，却猜得更准。泰特洛克还发现，这些“超级预测者”组队的表现更优于单打独斗，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习惯于将大问题分解成更小的问题，并且会先定下基准概率，考量手中所有信息而不只是新证，思考概率而不仅仅是某件事的真假，等等。

数学家汉娜·弗莱的《你好，世界》深入浅出地展现了算法和计算模型的工作原理，也出现在马蒂厄的推荐中。她举出大量现实案例，具体客观地评价算法的作用。例如，她探讨了COMPAS（美国地方司法体系中使用的机器学习系统，旨在为法官提供量刑建议）存在的局限与偏见，但仍对数据科学的应用前景表示乐观。